

# 1924年秋孙中山督师北伐浅论

严兴文

(韶关大学马列主义·德育课教研部, 韶关 512005)

**摘要** 本文论述了孙中山先生1924年秋在韶关督师北伐原因,叙述了北伐进军的过程,指出了北伐失败原因,同时对孙中山先生此次北伐进行客观评价,认为此次北伐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现代史,孙中山,北伐,客军

**中图分类号** K262

1924年秋,孙中山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亲自督师北伐,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也是他发动的最后一次北伐。本文就此次北伐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孙中山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实践。

## 一、孙中山督师北伐的原因

国民党改组后不久,孙中山在1924年9月初离穗去韶督师北伐,促使孙中山进行这次军事行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敌环伺,列强恫吓干涉。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基础虽然逐渐得到巩固,但在广州大本营周围形势并不容乐观,仍然非常险峻。一方面反动军阀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广州革命政府是孙中山在1923年春建立的,它管辖范围不大,只限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周围的三十余县,而且处于反动军阀包围之中:东面有陈炯明的军队盘踞,南面有邓本殷、申保藩的军队占领,北面有属于直系的方本仁军队,这些军队对广州政府都心怀恶意,虎视眈眈地想占领广州,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消灭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广东革命形势发展也引起外国列强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阻挠,因为“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sup>①</sup>,广东地区的革命化,不仅意味着它要丧失对广东的控制权,而且亦严重威胁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进行武装干涉。早在1923年12月,当广州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英、美、法、日、意等国为了掠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就调集军舰二十艘,集中黄埔,进行威胁。1924年8月,

广州革命政府又扣留陈廉伯非法运的大批枪械时,英国于8月28日出动九艘军舰集中到广州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与此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sup>②</sup>。英国等列强除直接武装干涉外,还间接支持陈炯明等反动军阀,“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想颠覆广州革命政府”;<sup>③</sup>并策划商团在革命策源地的核心——广州发动反革命叛乱。由此可见,在强敌窥伺,列强干涉下的广州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难怪孙中山说:“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sup>④</sup>是居粤之死因,因而,通过北伐解除险恶形势,求得生存和发展是孙中山此次北伐的重要原因。

第二,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复杂,潜伏危机。自1923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后,就在香港筹措军费、联络滇桂等军有功的邓泽如、邹鲁、杨西岩、梅光培等委以重任,让其掌握财政等实权,但引起了胡汉民等“元老派”的不满,于是围绕着内部人事安排问题,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存在着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或称“资本派”,因为孙科与港、粤拥有雄厚资本的财团关系密切而称)之间的斗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外省籍人士与粤省人士有些瓜葛,即使老党员中也互相抵牾,政见不一,如蒋介石与许崇智、杨蓀,以及杨西岩、杨庶堪等<sup>⑤</sup>,特别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迅速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右派对党内“跨党分子”、“共产派”进行无端指责,发起猖狂的进攻。面对如此复杂的内部关系,孙中山不得不穷于应付,费尽心血进行调和,然而他不愿意花费过多精力去处理这些难于调解的人事关系,希望自己能抽出身来做些“远而大”的事情,此是其一。其二,客军专横跋扈,危害桑梓,为孙中山所不容。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队,有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樊钟秀的豫军等等,这些军队都是1923年初入粤驱陈讨贼有功之军,但他们中真正忠于孙中山的只有粤军及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及其后成立的“党军”,其他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在各驻地专横跋扈,欺压百姓,强征税收,勒索民财,甚至与当地民团发生冲突。1924年7月,南海、九江之滇军违法苛捐,扰商病民,庇护杂赌,勒索蚕丝捐及水陆保护费等,以致“激动公愤”,九江商民罢市,商团、民团与滇军保荣光旅发生冲突,清远民团也与朱世贵部对抗。面对客军的所作所为,孙中山是非常清楚的,吴铁诚回忆:总理有一次正色对杨希闵等说:“广东是我桑梓之邦,各人随我来粤是为革命,非为扰民害民,你们这等行为,即为反革命,我何以对粤中父老兄弟”<sup>⑥</sup>,愤怒之情,可见一斑,但是孙中山不可能与这些客军决裂,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客军集体加入国民党,还因为他们是抵御陈炯明军反攻的主要力量;同时,孙中山不能背叛民众,否则就与他的主义相悖,因此处在夹缝中的孙中山异常痛苦,唯一能变通的方法就是率军北伐——把这些危害百姓的客军引出广东,打进两湖地区。其三,商团叛乱在即,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引起了以陈廉伯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恐惧。他们不断散布反动舆论,说“国民党赤化”、“广州共产在即”,并积极准备发动叛乱,推翻广州革命政府。1924年5月,广州市政府公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陈廉伯便指使商人向广州革命政府“请愿”,反对抽收铺底捐,并声称如达不到目的,即行罢市。同时,广州商团擅自召开广东省商团代表会议,成立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任总长,为了武装商团军,他暗自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并潜运广州。当这批枪械被广州革命政府察觉扣留充公后,广州商团进行

请愿罢市并将商团联防总部移至佛山,与广州革命政府相对抗,并致电大本营及党政军各机关,宣称:“此项团械,政府一日不发还”,“全省商团……势难再事缄默”<sup>⑦</sup>,广州商团还派人“四出运动罢市”。“胁迫罢市”<sup>⑧</sup>,“迭发诬底政府之宣言,遍贴通衢”<sup>⑨</sup>,可见广州商团肆行猖獗的行为已经达到无以复加地步,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由于他所代表阶级利益决定,当商团反动面目还未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时,孙中山不可能轻易就与之彻底决裂,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因此,在没有寻找到解决商团这一棘手问题良机之时又不愿因此“坐困”广州,是孙中山决定引师北伐的关键所在。

第三,国内各阶层形成反直大联合,有利于孙中山督师北伐。1923年10月曹锟倒行逆施,贿选总统后,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全国各地工会、学生联合会、商会等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声讨,否认“国会”的存在,否认曹锟为总统。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发表文章,指出“其在中国政治上影响不仅仅是加强反动而黑暗的军阀政治,而且一定要加强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力”<sup>⑩</sup>。孙中山还发表一个致各国政府的宣言,警告各国不得承认这个的政权。因此,国内各阶层业已形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反对直系军阀的大联合。但是曹锟和吴佩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对外仍然媚颜婢膝,卖国求荣;对内穷兵黩武,欺压百姓,残杀子民,扰乱地方,妄图实现他们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想把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扼杀在成长之中。为了共同对付直系军阀,孙中山不得不暂时与奉系张作霖、浙江卢永祥达成协议,结成“粤、奉、浙反直三角同盟”,以牵制和对付直系,保存革命势力。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备受直系包围攻击,势穷力蹙,电请孙中山出兵援助。孙中山权衡时势利弊,认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sup>⑪</sup>。因此决定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sup>⑫</sup>。

综上所述,孙中山此次督师北伐是各种原因合力的结果,江浙战争爆发,全国反直斗争大联合的形成,是北伐的良机,是北伐的必然因素,而广州革命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在内,商团叛乱即在,客军专横拔扈;在外,反动军阀环伺,列强干涉,且大有内外敌人合谋广州的趋势,是此次北伐的主要原因。因此,孙中山此次督师北伐,就不只是打倒曹吴、统一中国的单纯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也是解除内忧外患的重要步骤。

## 二、北伐进军过程及其失败原因

为北伐移驻韶关,孙中山于1924年9月12日,安排了后方诸事:胡汉民任广东省长,代理大元帅职权,廖仲恺则任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及广东省财政厅长,许崇智任军政部长,这是为支援北伐而进行的人事安排。次日,孙中山乘火车赴韶关督师,住在车站北侧一间二层楼的小屋里<sup>⑬</sup>。

9月17日,中国两军事集团吴佩孚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之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二天,孙中山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明确宣告:“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以造就自由独立之国家也”<sup>⑭</sup>,于二十日在韶关誓师北伐,旋即下令把北伐各军一律改称为建国军,分兵两路,向湘、赣出发。

北伐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湘、滇、豫、陕(于右任的陕军有旗号而兵员极少)各军向赣、湘北进。粤军吴铁诚警卫军一个营驻韶关,拱卫大本营,谭延闿以豫军樊钟秀为北伐军先遣军总

指挥,向赣湘边区前进,以滇军朱培德部编为右纵队向赣州樟树镇前进,以湘军为后继部队,并以宋鹤庚为总指挥,鲁涤平为前敌总指挥向赣州、吉安前进。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上旬,北伐各军不断告捷:豫军樊钟秀部绕赣、鄂边区,未经过什么剧烈的战斗胜利地到达豫南地区,滇军朱培德部占领南康,宋鹤庚等部攻入赣州,程潜部也曾一度攻下湖南宜章县城。到12月下旬,谭延闿率领北伐军由赣州向吉安进攻,在吉安近郊与方本仁的埋伏部队发生遭遇战。此时,陈炯明和赵恒惕各派军队从北伐军背后进行夹攻,使北伐军腹背受敌,弹药缺乏,加上孙中山已北上促使国内和平,于1925年1月被迫败退。此期间,湖南赵恒惕又乘机派了许多与湘军有旧关系的人,在湘赣边区勾引湘军回湘,宋鹤庚被赵勾引,随溃军从湘赣边区回到长沙作赵恒惕的座上客,方鼎英部亦被赵勾引,回到汝城,坚不返粤(当北伐军出发时,方鼎英卧病在广州)。方鼎英闻讯,即赴前线,行至南康,即遇谭延闿败阵下来,于是商量善后办法,重新整编湘军,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基础<sup>⑧</sup>。

综观此次北伐,虽然兵分两路出击湘赣,但兵力大部分投入江西战场,为什么如此重视江西战场呢?是因为浙赣毗邻,从广东方面进入江西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最低限度可以防止江西直系军队参与对浙江的攻击,从而间接支持浙江的卢永祥。孙中山在给刘守中等人信中更表明他的宏图大略:“北伐各军,已入赣境俟下南昌,即会师武汉,与诸君共定中原”<sup>⑨</sup>。我们看到,孙中山这幅进军蓝图,与当年太平天国首义于金田,出两湖,下长江,北伐西征多么近似!但为什么这次北伐却以失败而告终呢?除了历史条件不同外,主要有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依靠客军作战,战略方针失误。此次北伐,孙中山所依靠的是湘、豫、滇、桂等客军,这些军队因没有经过改造,故带有旧军队的残余思想,革命性不彻底,加上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意见分歧,思想不统一,如湘军总指挥宋鹤庚,与前敌总指挥鲁涤平从韶关出发时,“便意见不和,大起冲突。”在作战方针上,又指挥不当,对方本仁“引我深入”,有些将领却“毫无戒备”<sup>⑩</sup>,以致于轻敌冒进,造成腹背受敌的难堪窘境。

第二,物资缺乏,供应不足。广州革命政府自建立后,由于受频繁的军事活动的影响,使得财政非常困难,“已濒绝境”<sup>⑪</sup>,造成物资奇缺,军需用品供应不足,甚至连士兵所必须使用的枪支弹药亦不足,“赵成梁部在韶已练就徒手兵数千,彼要求加枪两千……李国柱(湖南最热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枪一千”<sup>⑫</sup>。可见,军需物资供应不足,滞停了出发时机,错失及时进攻的良机,此是另一原因。

第三,后方不稳固,时机尚未成熟。离开广州进行北伐,必须保证广州这个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在当时北伐出发前夕,广州形势却非令人如意,甚至使人胆战心寒:商团正密谋叛乱,东江之陈炯明,南部之邓本殷又虎视眈眈地要颠覆广州革命政府,造成广州这个后方不稳固,加上革命阵营内部意见分歧,难以协调一致,因而北伐时机尚未成熟。

### 三、北伐的是非功过

对于这次北伐决策,在广州革命政府阵营内部,曾出现不同意见:国民党内部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共产党内部有反对者,亦不乏支持者,如谭平山、罗绮园、阮啸仙等,他们曾率领农团军和工团军到韶关支持孙中山北伐。作为革命领袖、广州革命政府最高决策者孙中山,他有多年革命实践经验,有驾驶时势权衡利弊的能力,对于北伐这样重大的决策,他决不会随便受某人或某一集团或某一派别的摆布,而且此次北伐计划原于曹锟贿选总统后的1923

年秋,因而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决非是感情的一时冲动。从孙中山发布《告广东民众书》和给许崇智等人电<sup>①</sup>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志在北伐,并非真正想“舍弃广州”这个根,恰恰相反,是想通过北伐以存粤,防止直系军阀蹂躏广东,危害革命政府,消灭革命势力,更深层的意义是想通过北伐寻找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为广州革命政府打开新的局面,把革命势力从南方推向北方。

从北伐本身看,由于“党军”正在建设中,所以孙中山进行北伐所依靠的军队只能是滇、湘、桂、豫等客军,即使如此,军事力量与直系军阀相比,仍是非常弱小,难于对付直系军阀,因而利用“三角同盟”中的皖、奉两派军阀,甚至西南军阀去对抗直系,实是可行之策。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孙中山的北伐和军阀之间的争夺是有所区别的,直、皖、奉以及西南军阀之间的争端,是为了地盘和权利而进行角逐,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华矛盾;而孙中山的北伐,“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sup>②</sup>,具有反帝反军阀的性质,这就把北伐与军阀混战严格地区别开来,因此,孙中山发动的最后这次北伐决非是“毫无裨益”<sup>③</sup>,恰恰相反,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孙中山亲自发动的这次北伐,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

首先,沉重地打击直系军阀统治。这次北伐,各军很快就占领赣南各县,使江西直系军队纷纷北撤,“赣南之敌,恐慌非常,多向南昌、吉安移动”<sup>④</sup>;同时激化了直系军阀内部矛盾,加速了它们之间的分化,使曾受革命思想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曹錕从总统位置赶下来,沉重地打击直系统治。

其次,传播了革命思想。此次北伐,孙中山曾召广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组织农民自卫军前往,农民自卫军抵韶后,一边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支援北伐,他们在北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农民运动的影响。到1926年5月,北江地区已有曲江、英德、乐昌、南雄等县相继建立农会组织,会员达到一万五千多人<sup>⑤</sup>。随着农民运动发展,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也相继开展起来<sup>⑥</sup>,通过组织工会等各种活动,宣传了马列主义、传播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所以,到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该地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或当向导,或当侦察,或当挑夫,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再次,积累了丰富经验,启迪后继者继续北伐。这次北伐,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教训是非常深远的:要取得北伐战争胜利,就必须有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有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做好部队后勤和宣传鼓动工作,处理好财政经费问题和各方面关系。这些经验和教训,启迪了孙中山的后继者,使他们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取得再次北伐的胜利。

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11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5月上海第1版;

②《华字日报》汇编:《广东扣械潮》卷2,第91页,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版;

③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原载《向导》第107期。

④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2、17、15、76、205、233、76、205页,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书印行,1936年版。

⑥孙中山对滇桂军的横暴虐民感到非常愤怒。同样记载还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45页,第42辑第238页。

⑦《广东商团全体团军致大本营等代电》。《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⑧⑨《廖仲恺集》第213页,第211页。

⑩《向导》第42期。

⑬吴宗泰:《孙中山北伐在韶关》见尚明轩等主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7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⑮⑰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

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第216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2版。

⑳见《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17页“致许崇智等电”和第123页“致杨希闵等电。”

㉑(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7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㉒《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㉓《韶关概貌》第61页,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编,1984年10月。